

分类号: _____

单位代码: 10033

密 级: _____

学 号: 159320125100077

中国传媒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中文论文题目: 主权国家间的边际运动——论全球化在美国
全球军事部署中

英文论文题目: Lateralism – The Globalization of US Hegemony
after World War II

申请人姓名: 曹 阳

指导教师: 欧阳常林

专业名称: 工商管理

研究方向: 传媒经营与管理

所在学院: 商学院

论文提交日期 2020 年 5 月

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 中国传媒大学 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曹 阳 签字日期：2019 年 10 月 30 日

IJSER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 中国传媒大学 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 中国传媒大学 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和传播，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曹 阳

导师签名：

签字日期：2019 年 10 月 30 日

签字日期：2019 年 10 月 30 日

中国传媒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论文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参考 MBA 教育指导委员会相关规定，结合 MBA 教育的培养目标和要求，特制订本要求。

MBA 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学生本人独立完成，不得抄袭他人的文章和剽窃他人的成果。学位论文必须符合《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编写规则（暂行）》规范，引用他人的材料必须注明出处；利用合作者的思想和研究成果时，要加附注。经中国传媒大学学术委员会和研究生院同意，学位论文可以是以下几种形式：

1. 学术研究型论文

学术研究型论文，要求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新见解或新成果，并对本学科发展或经济建设、社会进步有一定意义，表明作者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学科知识，具有从事学术研究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学术研究型论文必须是一篇系统完整的、有创造性的学术论文。

2. 案例型论文

案例型论文是根据所了解企业的经营情况，围绕企业管理问题对某一真实的管理情景所做的客观描述，并进行案例分析，要体现管理理论与方法在实际中的应用，案例选择应注意典型性、代表性和实用性。

3. 调研报告型论文

调研报告型论文是运用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和统计方法，对企业值得总结的经验或教训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提出见解和建议的一种论文形式。

4. 企业诊断型论文

企业诊断型论文就是调查和分析企业经营管理的实际状态，发现其性质、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并以建设性报告的方式，提供一系列的改善建议。

5. 专题研究型论文

专题研究型论文侧重于实际应用研究，要对所要研究的实际管理问题进行清晰的阐述，并论证解决此问题的理论意义和推广价值，并对国内外本领域研究动态有一定的了解和评价。

6. 商业计划书型论文

商业计划书型论文是国际上许多商学院普遍采用的论文形式，现代商业社会对商业计划书的要求越来越普遍和严格。银行贷款、公司发展战略、公司资源的均衡使用等等，均少不了商业计划。因此，把商业计划的形式作为 MBA 论文的一种实为必要。

主权国家间的边际运动 ——论全球化在美国全球军事部署中

摘 要

国家的发展未曾不受外国势力深度干预，理论称为“权力互赖（power interdependence）”。全球体系的制高点由美国太空指挥部压控构成当今全球政治力量。全球化的发展和区域性的统一辩证活动中形成了美国全球军事部署中主权国家间的边际运动。本研究从殖民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视点介入，多方历史关联入手，并最终整理成文。

关键词：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军事部署；文明的冲突；改革开放

IJSER

Lateralism – The Globalization of US Hegemony after World War II

ABSTRACT

This is a preliminary search and research of world order and global politics. It is history-based and examines the concept of globalization as a result of causes. The prevailing hegemonic power of United States is constituted of physical presence of troops, financial power, and most importantly, predominance in lateralized power in governance bodies around the world. Time is never linear per se in concept or in discoveries, sovereignty as so. The preeminence of space entities and discoveries of planet management is changing the modality of border management and territorial groupings. The entities of the knowing and the consistent devising of apparatus and distribution continues altering globalized political entities. The exacerbating move on deployment of U.S. Space Command and militant service over Starcom has again like the Cold War compacting regional stability. This paper digs into the phenomenon.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Cold War, Clash of Civilizations, Reform and Opening.

目 录

1. 导论.....	2
1.1 语境概述.....	2
1.2 概念的获取.....	2
1.3 问题的定义.....	3
1.4 问题的提出.....	4
1.5 文献综述和概念框架.....	6
1.6 认识论和方法论阐释.....	13
1.7 正文结构和创新.....	17
2. 重商主义全球化.....	19
2.1 由大海与商贸构成的全球化.....	19
2.2 殖民主义下的民生问题.....	21
2.3 前二战的多边主义.....	23
2.4 小结.....	25
3. 现代化与文明的终结.....	26
3.1 规模性市场工业对文明的终结.....	26
3.2 熟识化记忆与文明.....	28
3.3 文明作为社会人的“三一律”.....	30
3.4 小结.....	31
4. 超越意识形态的海洋.....	33
4.1 中心与外延.....	33
4.2 宇之星辰下涛海.....	34
4.3 浩瀚星海辛探垠.....	36
4.4 小结.....	38
结 论.....	39
历史文献.....	40

1. 导论

1.1 语境概述

具象是对实在认知的基础，具体认知通过概念形成智识的交往。观念以概念的抽象形成语言实在使人类群体间的非行为沟通成为可能。语言的非直接人际传播是载体的介入，并形成语言的时空效应。语言本身即构成知识，并通过主观的主动接受形成知识的伦理，以客观认同和发展性探索形成知识的累积和增量。知识相对于实践经验在行动上滞后的，哲学赋予了知识超越知识的线性代际关系的可能。历史是历史的实践，对实践的研究就是对当下的测量。对历史的研究并不能预测未来，但对未来的理解和构建（conception）离不开历史研究。权力有区域、区域间合法性基础。没有区域化的相对稳定可控全球化就是“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战争状态。相对静态的国家（state）由此构成全球政治的基本单位。国际法和国际经济由外交史研究转向跨国实践形成规范，构成主权国家概念。国家主权的实施和主权国家的行动改变着观察视角的动态。文本、语言阐释通过事实客观以对性别中立的他者进行推断性研究，并形成对现象的解释性研究文本。研究形成于对参与的脱离，文本形成于对研究的脱离，它是一种对延续性现实的剥离，同时也是对剥离的现实的整合。

1.2 概念的获取

概念的获取以先验的观察和后验的校对共同作用获得特定语境内的意义。概念在特定语境内的意义通过展开与整合构成定义。定义决定文本和语言的相关性，并在交往过程中形成常态。语言和文化的共同作用改变着社会人文发展。这便是由文本形成的知识。技术革新改变了知识管理的工具理性但并不改变知识对人塑造的实质。个体对知识的主观定义，即人对知识的主观处理，定义了人的认知模式。人的认知由此形成观念，观念构成他者目中的看法，并通过综合性知识活动形成新的发展。这就是罗伯特·考克斯所言的“知识的赋权（empowerment）是一个问题——这是知识的政治”。¹本研究在主流官方历史语境而言是反建构的，祂希望在表面和现象的真实间寻找另外的侧面（alternative aspects）。从

¹ Robert W. Cox. The New Realism: Perspectives on Multilateralism and World Order[M].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xxii.

研究的反命题而言史蒂芬·吉尔认为多边主义可被定义为政治手段 (political means)。²

1.3 问题的定义

史蒂芬·吉尔以辩证法观念定义全球化，他对全球化概念定义的语境植根于盎格鲁美利坚新自由主义一套理论。罗伯特·考克斯以现实主义理论语境作为分界，全球治理作为观念出发点将多边主义概念的形式框定在非等级制度但在现实中遮蔽和模糊化主导-从属关系的协作。史蒂芬·吉尔由此将多边主义定义为如“可持续发展”的术语，取决于其理论角度或话语 (discourse)。在此意味上多边主义被以权力和法律概念解读，视本体论为问题导向 (question driven) 的研究对象。主流学者将历史建构的世界秩序作为既定以问题解决 (problem-solving) 理论本体即史蒂芬·吉尔所谓的“国务和市场 (states and markets)”本体修正既定秩序以确保现有权力结构和形式。历史改变的观念受感 (conception) 视为以民主为口号的契机以盎格鲁美利坚风格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形式重构“经济全球化”，其认识论是实证主义为主且应用上是跨历史 (trans-historic) 的。“全球化”概念因而广泛的被“全球劳动分工”所替代。商品经济通过金融体系从市场植入科技权力及触及率。发展中国家 (developing country) 的发展在此语境下由此被系统化定义。世界政治的机构化是全球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权力的系统 (化) 管理标志了国际组织的机构化。从另一个角度定义则是通过对权力的机构性组织管理其关系得以以物质属性呈现出某种模式 (pattern)。领土的财政化标志了后冷战主权信用体系的建立并结束了布赖顿森林体系美元与黄金的直接兑换，结束了军事工业复合体的政权发展模式。玛丽·柯道尔 (Mary Kaldor) 将科技创新的优势元素与经济理论结合覆盖了地理政治纵轴和量性周期，世界银行全球金融地产体系、信托基金、全球军事部署构成了实体边界控制措施，即史蒂芬·吉尔所言的大西洋资本主义的控制观念。国别性的知识生产塑造了主观文化概念身份认同和本体认知模式，并秉承着人本发展理念。全球体系下知识的生产服务于必要劳动分工管理、区域化市场建设和植入。国家主义导向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国内法立法原则保障了劳动力人口的区域化属性规范。在反殖民主义 (包括经济殖民的泛殖民主义) 概念和国家主义话语

² Stephen Gill. *Globaliz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Multilateralism*[M].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97. Pp. 7-8.

前提下全球化得以成立的前提是什么是全球化概念的基本命题。大西洋宪章的建立和盎格鲁民族文化体在当今全球体系的支配地位是全球化概念的对立命题 (antithesis)。跨国经济系统的建立是比较优势原理和商品经济市场植入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造成现有全球化观念实质构成全球重商主义。在因果关系上相较于全球治理概念重商主义向来是一个推进全球化过程的因素,主权原则在此意味上给了全球化和国家主义两个互斥命题之间的概念性介入,由而构成了 Bjorn Hettne 所说的双向运动。Bjorn Hettne 所提出的新重商主义概念正是全球重商主义在效用主义和比较优势原理的共同作用下形成。

1.4 问题的提出

外在力量的介入是相较于自然的人之间秩序构成的前提条件,这种前提条件的因素总是历史形成的。这种历史是某个时间段基于本土的既定和发生,即连续时空意味下的文明概念,亦是持续的跨文明发生和交流,即 Kinhide Mushakoji 所定义的外源性现代化。复合主义的动态和社会达尔文主义阻碍着全球体系的民主化,非西方国家对民主观念的重定义 Kinhide Mushakoji 称其为“指导性民主”。指导性民主观念是中国王朝解体后政治格局根本。也正是如此史景迁从既有现象的剖面和历史人文现象的比照出发解读认为晚晴衰落的一症结在于平衡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并认为由连接中央和外延 (center and periphery) 的新的政府综合体本能 (would have) 建立文化意味下可行的 (viable) 城邦式共和国 (republic) 而成为现代意味的议会选举制民族国家 (modern nation-state), 并通过利益的协商调配和改革削弱文明外部势力的影响。笔者认为这是需要否定的观念。正如其在《追寻现代中国》中所言:“对任何文化,包括自身和自身所处的文化的理解没有捷径。”本研究试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现有的全球化概念是如何形成的。在此笔者所指的《追寻现代中国》并不包括其时报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中文译本。其从近代中国史开始进行了大批量的改写已然脱离原著成为另一本书。

自然界并不存在国家但国家的构成基于有形地理空间。民族国家的历史文明经历了无数征伐与杀戮,通过不同方式构建和塑造封建制度并形成国家法。1970年 Prentice Hall 出版的 James T. C. Liu 和 Wei-ming Tu 编辑的《传统中国 (Traditional China)》以比较文明的视点、以西方哲学和文化观点、工业资本主义的角度分主题对中国传统文化信仰、封建政体的建制、生产和地理特征、法

理等方面进行阐释性梳理。不同于革命的历史逻辑，祂是一个“我们曾经是谁”、“我们曾经如何生活”、“我们曾经是怎样的存在”的参照。这种参照以经验依据（analysis on an empirical basis）成型，有助于理解和反思中华本土文化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这些观念一方面可以对照分析自五四运动以来文明的人文要素对中国近代政治的影响，另一方面可以更好的对史景迁的著作进行文本解读。与之对照的是 2004 年 Perennial 出版的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的著作《1421:中国发现美洲（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文化形成的人文群体属性和一般性、普遍性在现代国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话语下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提供了一种非物质属性的精神和人文意义参考。通过间接性文本参照本研究欲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具有如现世界体系盛行和主导的西方文化一般的价值。其并非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所描述的“第二代本土化”，虽然从实质而言回答这个问题有落入“印刷资本主义”之嫌。但祂有助于增进不带偏见的文化间客观理解。

在政治与经济的作用因上考克斯称政治权威试图重获对实体经济和货币（currency）的控制需基于对领土权利的获取，但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的控制者（act as protector）和更强大的领土权力形成更有力的介入性。全球军事部署的打击时效可以部分解释这种介入的可行性，组织和新自由主义机构化的配合以及科技发展创新增进着可测的深度和广度，也就意味着可控性。国家主义话语现象模糊着传统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关系，正如多边主义模糊着全球政治的现实。真实的真实性是基于既定的固态全知和动态可知之间的辩证关系。从国家现实而言“nation”概念从未真正脱离过“民族国家”概念，这即是一种他者的定义亦是一种生理属性现实。无论是孙中山时期“有意味的宪政（meaningful constitution）”还是 Kinhide Mushakoji 所提出的“将内容塑造得更有力”其实均不改变绝对的现实，仅仅是通过文字、文本的传达改变受体的自我感知，形成现代国家管理的一部分。祂利用的是人对其群体属性和之于群体中的价值体现的追寻，存在感知的一致性（unity）、行为或逻辑的连贯性（coherence）、身份感的归属（belongingness）等对所处、所在的确认，也就是对确定性的需要。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加入国际和世界组织，成为英美盎格鲁文化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自主性被深度削弱，并处于全球体系的掌

控之中。正如冷战所投射出的现实，“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治理体系（*minimalist government*）由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机构化和精准暗杀配套形成，主流学者的问题导向理论（*problem-solving theory*）形成了对专业化个体最为有利的策略，即中产阶级培育的政治。本研究落足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在现有全球政治范式中超越传统海洋国际法意识形态并达成祖国的和平统一。

1.5 文献综述和概念框架

加文·孟席斯的著作《1421: 中国发现美洲(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由作者作为海军的经验调查和推断论证了郑和船队全球航旅的惊人成就和地理发现，其时间范围甚早于哥伦布。在物质形态对比而言郑和的船队在制造工艺上或并不能与当时的欧洲相提并论，但在其航旅过程中所需要涉及的观测、定位、洋流的影响等，包括作者在世界各地博物馆发现的地图等方面所需运用的知识也是异于西方且远早于日心说获得公共承认的年头的。作者推断郑和的航旅是出于朝贡的目的，并实质承认封建王朝的中国发展时期并未对外域文明进行侵略性扩张，其地理发现也并未用作殖民意图。文献中并无明显证据显示郑和船队的全球航旅哪些部分是基于王朝政府任命哪些部分是出于自发的行动，但从中华近代文明的形成角度而言郑和舰队的真实故事在本土文化人文精神中的探索进取是有深远意味的。作为英国海军军官的孟席斯的发现和书著对饱受“百年屈辱”熏陶的中华历史烙印具有友善的积极意义和史学学术参考价值。中国近代的爱国主义运动从文化渊源上得益于跨文化活动，即“西学”、“洋学”。《传统中国 (Traditional China)》以西方哲学的观点、工业资本主义的角度分主题的从比较文明视点对中国传统文化信仰、封建政体的建制、生产和地理特征、法理等方面进行阐释性梳理。王红缨的文章《中国文化与多边主义 (Chinese Culture And Multilateralism)》很好的阐释了中国文化的世界观部分对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发展的人文动因影响，在国家形成 (*state-forming*) 层面这种人文动因同时也构成了同质性的竞争，对中国自清政府倒台后的政党政治特别是内战有较强的解释性。王红缨的文章源自多边主义研讨会并收录于《此新现实主义：多边主义和全球秩序的角度 (The New Realism: Perspectives on Multilateralism and World Order)》，是由联合国大学资助的“联合国系统和多边主义 (MUNS)”项目框架中整理而成，罗伯特·考克斯 (Robert Cox) 主编。相关系列包括由斯蒂芬·吉尔

(Stephen Gill) 主编的《全球化，民主化，和多边主义 (Globaliz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Multilateralism)》。王红缨的文章很好的回答了“为什么中国会是中国”的问题，即《传统中国》所指的“民族特征 (national character)”部分。

将“nation”概念意译为“民族”概念笔者主要参考于两个理论语境逻辑和历史逻辑。从历史原则上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盘点了后冷战的文明存在及各方实力要素。郭艳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全球化语境下的国家认同》中从主权国家语境更为深入的探讨了相关问题过去的历史意涵。而从去殖民化的历史进程而言大多国家的形成均以民族主义作为思潮动因，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通过文化习俗、语言、传媒、记忆等要素的分析抽样论述 (elaborated) 了这一政治过程。“nation”作为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形成的主权概念延伸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时期的中国大都以“民族”概念囊括。这同时也是彼得·奥尔特在著作《民族主义 (Nationalism)》中所使用的解释范式，即以“国家作为中心价值 (the nation as central value)”为基础提出的文化国家 (cultural nation)、政治国家 (political nation)、国家意识 (national consciousness) 和国家建设 (nation-building) 四个维度的定义模式。此定义模式对中国的话语体系和国家建设现象有较强的解释性，即知识生产的权力来源。但需要注意的是笔者在此将“nationalism”的概念统称为更为细分的“民族主义” (ethnic nationalism) 并不代表概念在原文中的意指。其原始历史性意涵需要从全球军事部署 (hegemony) 的理论语境展开，即地缘政治与权力政治。在自由国际主义的理论指导下，以经济发展、贸易和量化为基本线索，史景迁所编著的《追寻现代中国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在近代史部分以地缘政治冲突为主要编排的逻辑线索，同时涵盖文明间教育、文化交织变迁等多方面内容。史景迁的巨著内容翔实覆盖面广，被华盛顿邮报评论为“history at its best”——其跨文化、跨文明的具体意涵需要从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角度决定。在此笔者所指的《追寻现代中国》并不包括其时报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中文译本。后者从近代中国史开始进行了大批量的改写已然脱离原著文本成为另一本书。在对历史解读的政治观点上原著认为中国本应在清朝后建立有效的中心-外延 (center and periphery) 框架的议会民主制国家，并在近现代史部分着重梳理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事、外交关系。著作中同时包括从清朝开始的一些战事，国际、全球关系和军事安排与交易。从哲学角度而言这构成了笔者概念获取的先验和后验两个维度。当前各自（respectively）划分为国家的地理区域范围内均存在实体或非实体的实质主导民族是对该概念圈定的现实依据。大西洋联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此概念的代表。盎格鲁民族是当今国际体系的缔造者和全球体系的统治阶级，维护国家资本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state and interstate capitalism）经济模型，即新自由主义式的经济全球化。

在确立了“nation”作为“民族”概念的前提下国际（international）概念得以圈定其“民族国家间”的本质意涵。这即符合权力互赖（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理论亦是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曾经面对的现实。八国联军侵华和西方海外资本集团、垄断企业在亚洲区域的建立构成了王朝时期的反体制力量，即矿业控制以黄金为代表的贵金属纸币文化，恰是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所述：“正是为了上帝和黄金，西方人在 16 世纪向外征服世界”。在历史文明的实践中从现实主义角度北洋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实质（de facto）且未获得国际法承认或华盛顿的法理认可（de jure recognition）地构成了中国北方的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雏形。根据纪录片《二战重大事件（Greatest Events of WWII in Colour）》第一季第二季的叙述结合刘明宇的论文《浅析二战时期德国的民族主义》、邵俊敏的论文《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工业经济分析》，和史景迁历史叙述中的潜文本，以及 FBI 公开的部分档案、爱因斯坦给罗斯福写的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单方面毁掉凡尔赛条约并发展空军和潜在的开发核武器，蒋介石希冀通过对德国的依赖可帮助中国抵御日本霸权（hegemony），利用对现代军工有重要作用的湖南北部和南部占世界产量百分之六十的高纯度锑资源、湖南和江西占世界产量一半的钨资源，与德国达成军事-工业协议（dealing），并在 1935 年 5 月通过德国驻上海总领事（consul general）直接电报希特勒支持与南京政府的约定（arrangement），并且“无论看上去多么有吸引力也不要与任何其他中国公司谈”。这在经济上构成了中国南方历史上的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实践。苏珊·斯特兰奇在收录于《此新现实主义：多边主义和全球秩序的角度》中的文章《Territory, State, Authority and Economy: a new realist ontology of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中取牛津英文词典对“multilateralism”的历

史含义解读为“多方的 (many sided)”，即中文所使用的“多边”概念，但并不假定作为“states”的国家、或其政府是唯一构成“边”的权威。

《此新现实主义：多边主义和全球秩序的角度》和《全球化，民主化，和多边主义》是联合国系统和多边主义项目框架下系列丛书的第三本和第四本，分别始于1992年秋和1993年的研讨会 (symposium)。根据考克斯和史蒂芬·吉尔的梳理历史而言对国际关系的学习源自外交史，外交史转变为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并脱离国际法和国际经济成为政治力量的决定性要素/因素 (factor)。“multilateralism”概念作为术语在用法的相关性上被联系在自由主义机构化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和新现实主义 (neorealism) 的处理世界政治的方法 (approach) 上。新现实主义以作为“states”的国家为基本研究对象 (unit)，他们具有可计算的力量和追求的特定利益。其在认识论层面更多是实证主义的 (positivist) 在实践层面更多是跨历史的 (transhistorical)，其核心解释门类衍生自主权原则、国家间 (inter-state) 权力政治、自由市场经济。从美国霸权时间的倒叙而言七国集团、联合国代理机构、国际联盟、欧洲协调均倾向于以现有或既定优势权力定义全球秩序的问题 (problem)。机构化的目的是构建和法典化 (codify) 一系列规则、常态、原则以维护具有压倒性元素 (prevailing elements) 的态势 (supremacy)。新现实主义以普遍的非历史条件为指导思想，政治的基本原则保持对修昔底德的理解。新现实主义在冷战的成长环境反映出他们的时代思维。新现实主义者追求科技掌控的权力，历史对他们而言仅是一堆描绘未曾改变的博弈的数据。在历史和概念的对等性而言刘洪强对中国历史观念中的“country”在《“抽象的国家”还是“行动的社会”？》一文对大革命期间的醒狮派进行了详尽描述，中央党校的博士郭艳的学位论文在全球化语境下将“country”概念和“states”概念做了更为深入的整合，因而“states”即是中国行政区划中的“省”、“直辖市”、“自治区”等一级行政区概念。如按照军事部署权的划分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也是与“states”对等的概念。在此意味上正如史蒂芬·吉尔所言多边主义“可被理解为增进全球合作的过程，和涌现于全球政治、公民社会力量的政治和思想体系 (ideological) 斗争的场所”。从概念的发展性角度而言考克斯认为我们可以以“全球治理”作为锚点 (starting point)，无论是中央集权 (单边) 的或去中心化 (联邦) 的等级制度。多边主义则是非等

级制度的协调配合，在现实层面掩盖和模糊化主导-从属关系的现实。因而“多边主义”的核心概念、概念前提是“主权民族国家间的协调、协作（coordination between and among sovereignty nations）”。也因此联合国系统和多边主义项目框架的目标是“在广泛参与的全球社会基础上自下往上建立新的多边主义”。正如武者小路公秀（Kinhide Mushakoji）所说：“现行主导霸权对‘此新世界秩序’的解读使仅由全球军事部署和联盟的自上而下的介入（intervention）正式化和合法化。”

殖民主义以地缘政治和经济结合的范式进行全球发展，海外利益的获取和量化管理是金融体系机构化的基本特征。玛丽·柯道尔（Mary Kaldor）收录于《正加深的危机：后新自由主义治理挑战（The Deepening Crisis: Governance Challenges after Neoliberalism）》中的文章《战争和经济危机（War and Economic Crisis）》以新熊彼特长波理论回溯了1770年代至2000年代的技术革命对资本主义发展和海外市场扩张的影响。但正如斯蒂芬·吉尔所言“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模式缺乏合法性因此更多反映为支配（dominance）或一时的优势（supremacy）”。也因此在其发展和实行中人群-政治性的正义观大多被分配和再分配的义利观所取代。对美国政治而言即“花在经济和军事援助上的美元通过对美国制造产品的购买形式返回到美国”，其政策表现则是苏珊·斯特兰奇所指出的三角模型。北洋政府和蒋介石政权的多边主义实践的失败一部分可以以信息的不对称和议价能力的不足解释，但他们的行径均错位了文化主义的目的善和国际问题的政治手段，以“助纣为虐”的方式参与到多边主义行动以寻求国内经济政治利益。马列主义作为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和北大西洋联盟的反面命题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是不和的，但在地缘政治的根本而言后者是通过水路海上权益对其他文明进行改造和利益获取。从根本模式上安全利益是其一重要考量因素。也正是在此意味上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期间全球军事部署（global hegemony）不仅是如斯蒂芬·吉尔所述“承诺于某种控制概念的跨国连结社会力量”，其根源在于技术革新的应用与“变现”。根据《追寻现代中国》的陈述1936年希特勒与日本形成了“反共产国际公约（anti-Comintern pact）”并支持德国与伪满洲国的商务往来。蒋介石虽与前苏联有互不侵犯条约但在日本侵略中国时国际联盟并未采取行动。1939年苏联和希特勒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蒋介石的抗日行动受到日本战报

拦截和国军轰炸不准、低效的困境。同时日本通过德国外交渠道施压蒋介石和谈达成协议。

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公开档案角度看至少从 1939 年 10 月 11 日罗斯福收到爱因斯坦 8 月 2 日寄出的信作为美国得知纳粹德国的巨大潜在威胁的最晚时间。如果排除当时可能的其他军事情报，至少最晚在 1939 年 9 月 1 日罗斯福从白宫收到驻巴黎外交官 William C. Bullitt 的电话称德国进攻波兰并轰炸了几座波兰城市时罗斯福得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战略均衡被打破。1941 年 12 月 7 日罗斯福午餐时得知日本袭击珍珠港和其他太平洋设施后，美国总统罗斯福指示起草预于第二日国会联合环节（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的演讲。在对打印稿的亲笔修改中，他将军情的时间感知和空间区块隐去并以短效、突发性、价值判断引导的词汇替代，并加入了以受到屈辱的经济利益语汇（solicitation）谈及与日本政府和天皇（日本人）在太平洋持续和平的对谈。在地点的推进上，罗斯福在讲稿开始部分以“欧胡（Oahu）”代替“夏威夷和菲律宾”，将“马尼拉和欧胡”改为“夏威夷岛”；在演讲的视频资料中罗斯福在“马尼拉”后进一步加入了香港、关岛、菲律宾岛（手改稿原定是有的）、提维群岛，以及当天新得知的中途岛。在对国家记忆的塑形上，罗斯福在宣誓自己作为军队和海军总指挥后深度加入了带有屠杀和侵略意涵的字眼、发音上和“家”以及“全”混含的定语修辞“国（nation）”，并删除“country”概念的“国”，以激发（address to）受众的主观正义力量感（righteous might），并在陈述“敌意是存在的”后在人民、领土、利益的字眼上强调（accentuate）“我们的”定语，最后宣布美国和日本进入战争状态。罗斯福在美国国会涉及远东战略的演讲结束后不久丘吉尔访问华盛顿。为了外宣的目的罗斯福说服丘吉尔将英国殖民地列为分别的国家（nation，即民族国家），形成了由北美东海岸为核心连接西欧、东欧水域、南非、中国和苏联的网络，即大西洋宪章，誓意打碎德奥意三国同盟条约的历史延续性。在对国际联盟的替代组织联合国架构的设定上罗斯福将美国、大不列颠、苏联和中国列为“四警察”。在福特主义的遗产和英美盎格鲁文化共同的体系价值观暨大西洋宪章的整合帮助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了对战事的后发优势。在此意味上“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和洋务运动的思维模式一致出于对工业利益的过度依赖和对国际组织的迷信。而对华盛顿而言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与其说

是出于“承认”不如说是为了维护在华利益。正如《追寻现代中国》中所言，在华盛顿的意见中对国民党政府的关税认可构成了对其事实和法理的承认。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后丘吉尔访问罗斯福于海德公园的家，决定同意将核武器研究保密，并首先用于轰炸日本直到其投降，且事后两国政府继续军事和商用目的的开发合作除非且直至终止合约。俩人还确认了需调查玻尔教授的活动并有措施采取以保障他不泄露信息，特别是对俄国人。

相对于资本主义新熊彼特特长波理论范式和溢出效应的跨国发展社会主义作为民族国家阈值则形成了主权的相对概念。在主权概念下民族即国家领土范围内的民族分布。国际法作为约束主权国家的法律未曾脱离资本主义市场拓张的需要。彼得·辛格 (Peter Singer) 在其著作《一个世界：全球化伦理 (One World: The Ethics of Globalization)》中即阐释了，包括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国际实体以拉萨·奥本海 (Lassa Oppenheim) 1905 年对国际法的文本为准则，唯一的测试是祂是否能有效控制其领土。“无论什么样的政府的领导人都可以从其他国家或者国际借贷实体借钱，并且如果祂们被推翻下一任政府则被看作是有义务根据前任的签名偿还债务。否则祂将被排除在国际金融组织外并遭受不利后果。”也正是在此基础上 Bjorn Hettne 在《双向运动：全球市场对区域化 (The Double Movement: global market versus regionalism)》中以卡尔·波兰尼 (Karl Polanyi) 作为理论基础，认定“现代社会必须被理解为市场机制的扩张和社会对市场机制在‘自由’ (无约束) 前提下运行方式的毁灭后果的自我保护”并且“有强烈的经验证据表明高度的社会不安感会将其转化为政治反抗，由此负面影响经济自由”。历史上接受的美民主党借贷的袁世凯政权及其延续的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段祺瑞政权是典型案例。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主权信贷上的近乎垄断延续了资本-政体收益模式，并通过机构配套加强政治稳定性的风险控制，即主权原则。换言之正如 Kees van der Pijl 所说的经典帝国主义可被看作是“自由国际主义和国家垄断 (state-monopoly) 争夺至高权力”。所以也就是在国家主权和主权国家间的语境下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功能性的全球分工，和比较优势理论形成现实安全范式的经济基础，也是国家间 (inter-state) 权力政治基础。“贸易战”从本质而言即是通过国际组织手段在科技-军事、军技-市场发展范式下进行的“降维打击”手段。从制度层面而言“民

主国家间不会互相发生战争 (democracies don't fight each other)” 的论断源于 1911 年美利坚合众国和英国之间的仲裁条约使两者间的战争非法化作为争端决议 (conflict resolution); 1912 年大不列颠共同财富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的银行家们从伦敦转到纽约; 1913 年美国联邦储备系统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建立。企业自由主义 (corporate liberalism) 由此构成了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基石, 也由此奠定了盎格鲁美利坚银行金融体系大厦。盎格鲁体系在地缘政治上劣势互补, 资源上优势集中, 在民主制的充分沟通下易形成一致对外的联盟态势, 即其政治的协调性。

国际组织的合法性源自合法性的主权概念, 威斯特伐利亚的国家间 (inter-state) 体系在区域化层面构成全球结构的稳定性因素, 即考克斯所言的“等级制形式”。在中心化主权语境下外国直接投资 (FDI) 构成的则是国际间的主权财富延伸。即古祖雪在《联合国与国际法结构的现代变迁——纪念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 (英文版)》中提到的“国家主义导向的国际法”。《此新现实主义》一书的核心课题是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全球结构转变, 复合结构 (pluralism) 构成传统社会和文明相对于北约主导的拉丁语系西方文明的主要论证项, 这也符合像潘忠岐和黄仁伟等中国学者的研究方向(《中国的地缘文化战略(英文版)》)。笔者将语言、语系作为文明的划分方式主要 (primarily) 基于人主体间交流的一般性和基本性是语言基础的, 人的理性是通过语言-文字-语言的交互系统得以达成而获得社会意涵的主体间性, 在方法论上即李遥在《论文化的规范性研究》中的所指 (能指和意指)。“多边主义”因此可被定义为主权语境下的派生概念。在此“派生”意指的是概念自身并不存在本质意涵, 而仅是根据各方实践需要而被定义的发展性概念。由此多边主义组织也可以被理解为管理主权国家间权力关系或对权力关系进行管理的组织。在此权力是现代国家公共语境对事务 (政治层面) 和事物 (经济层面) 的支配能力。

1.6 认识论和方法论阐释

在对国家机制的理解上笔者分三个维度阐释: 对居民的保护范围, 即私有领域和主权财产部分, 换言之即国家安全维度; 发展性积累, 即物质维度; 以及扩张性倾向, 即权力的影响, 包括但不限于物质和非物质形态。例如美国的 APA (美国心理学会) 格式的论文写作和漏斗结构模式即服务于其地缘政治利益结构的学

术传播，即“自上而下”的模式；在干预和重构上则主要采用实证主义（positivism）、后实证主义、结构主义、批判理论，以及其形而上学的变体或混合模式。多边组织的系统化规则基础即其限制性对既有结构优势的保护性措施。原则基础的管理增强合作性和去冲突化。市场经济即可理解为多边主义组织管理下以原则为基础的交流/交易场所，并将国家间的分歧和政治博弈以政治经济系统模式进行非肢体暴力的干预和调节。从实体而言市场经济是居住性构成的因而也是区域化的。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即经济特区的改革模式。而全球市场即可以是实体的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也可以是虚拟的，因而在虚拟市场层面中国的机构化模式更倾向和类似于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模式，即玛丽·柯道尔（Mary Kaldor）在《战争和经济危机（War and Economic Crisis）》中提到的福特主义操作形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于跨国企业运营（transnational corporate）本质并不具有长期的居住性因此并不具有所在国的主权权力或权利，其实体和法律属性是和其物理属性倒置的，因而其政治经济和经济政治的动态形成了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现象，并形成某种权力真空。长臂管辖和全球军事部署均可归于这种权力真空之中，它类似于帝国主义时期的法外治权，也由而产生主权原则上的分歧。在公共领域的政治话语（political discourse）上区域化的温和重商主义的经济扩张倾向跟长臂管辖和全球军事部署的权力真空之间形成的话语权和实体权之间的交锋使得规则基础的干预和原则基础的保护主义之间形成了中美结构关系的困境，即冷战思维陷阱。

从经济和金融角度而言地缘政治作为主权国家非居住性公共化领域及延伸提供的是安全产品和区域发展的基础物质，例如基础设施建设和石油等。从文本解释层面而言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结合的西方经济学流派即是现代国家的外部投资（如史景迁所言的“oversees venture”）内部化、模型化、量化进入领土范围内进行管理的模式，换言之即非传统现代社会（civil society）和政府（治理）模式。供给侧经济学和现代社会的维系由工业体系决定，固定公司（firm）由工业模式与发展根据产业链布局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式样（pattern）。在此意味上全球化所提供的相对自由即经济意味上的行政区划（state）空间。以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代表的自由贸易体制（free trade regime）构成了时间与空间的流动机制。文化产品

和地缘文化战略一方面是对文明历史遗产的保护另一方面同时也成为人的本土或文化归属的感知，在空间局限性下人的发展和成长的环境虚拟，构成空间的多样性形态。多元文化在文明交集和交汇较多区域则形成一定发展态势，增进人文形态的变化、变体、形成等，构成社会形态变迁的力量。经济-政治博弈和不确定性形成于社会形态的变迁，同时改变着市场和社会平衡，以及研发市场化的非技术性方向转变，部分构成且构成部分人群流动的非理性因素，虽然笔者认为理性是一种习得正如概念性的自由、对自由的认知和认识是一种理性习得。因而结构调整意味着新的需求。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重（voting strength）由金融贡献而非主权决定，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以市场准入为原则，在“以出口拉动内需”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延续以及部队对外汇和自主创新武器售卖的自主权之间的作用下两岸关系和中国南方的发展与北京和北方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结构转型期间矛盾显著，同时也是贸易战的“战”之所指。复合主义（pluralism）则意味着从体制内部入手对社会思想结构的转变。

在外源性现代化进程中笔者以功能性将地缘政治拆解为三个维度：对地理分布不均的资源的获取，对应的是现实政治；对领土范围内权威和秩序的维护，对应的是国家社会机制和政治经济；跨区域部署，对应的是权力政治。从现实政治层面而言土地改革和领土权益是中国现代政治的基础，祂基于中华文明的主要经济模式，在外源性现代化进程中构成了国有企业的政治基础和资源密集型发展的基础。美国在技术和军事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向来保持着绝对优势，并通过原材料和市场的获取形成权力和经济的良性循环发展。全球军事部署一方面服务于权力政治，另一方面服务于对位于其他国家境内的资源获取。信息技术的发展拓展了媒体渠道通过个人终端的到达率、影响力、穿透力，包括权威机构对信息获取的控制力，因而也深化了情报机构对以人群为基础的政治-社会现实的影响。技术范式的革新和精准打击能力的创新使得全球军事部署大国在领土问题上可以借助信息渠道的精准释放形成较大范围的社会影响。苏珊·斯特兰奇所说的“分而治之”同时也是冷战后亦未改变的战术理性。国家管理和全民所有的土地政治制度虽然保障了自清朝以来中国近代政治领土权的国内政治基础，但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核心支撑的强权政治从未失去其历史相关性，未来导向的西方正式主义亦从不将历史作为一种客观性文明定论的存在。这虽构成中华文明与西方文

明较大分歧处但也并不改变西方文明的正式同样建立于历史与思想史基础之上。麦迪逊“生者不应由死者统治”的论断在当代同样形成的是死者统治生者的事实。

对于多边主义而言全球军事部署同时扮演着一个“他者”的角色巩固主权国家民众的身份感知和确认，正如考克斯所言“领土同样也是政治的基石当政治寻求重申对经济的权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世界银行的设计是以资本主义感知组织全球经济，在“自然”和“历史”的自我文化、社会、信仰、政治连续性感知中社会生活被赋予了主观意义，工作价值被社会或经济意义衬托，外源性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人对“秩序”的需求在多边主义进程中获得了满足，形成了政客-政府-民众在主-客观感知交互互性下实体或主体间性间的合谋，也因而国家被喻为机器人被喻为螺丝。“现代社会必须被理解为市场机制的扩张和社会对市场机制在‘自由’（无约束）前提下运行方式的毁灭后果的自我保护”的论断中的“必须”为的即是植入市场机制及配套规则。郭艳论文中马克思主义对国家认识的相对概念是典型体现。在“主权”国家异质性感知下这种他者的介入和市场手段的植入也很容易擦枪走火，伊拉克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同时也包括马歇尔计划和冷战。虽然中文将 League of Nations 普遍翻译为“国际联盟”但从文化的主观意味而言“league”同时带有前锋、先锋之意，其实质意涵应是“民族国家先锋队”。从单荷性（monolithic）文化角度而言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作为“联合”的过去式“united”的民族国家同样暗涵着主观文化间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权力政治而言强化了北约的海洋扩张以及基于海洋角落的空军能力（触及度和干预时效）。由于西海岸有大不列颠的传统优势，东海岸亚太地区有珍珠港事件的缘由，罗斯福去世后杜鲁门将两颗原子弹均投放在日本是符合战略布局优势最大化的。从地缘经济层面而言领土承认是不符合任何主权国家国家主权的扩张需要的。也因此都会根据利益考量以言论或者机构主张削弱影响，或在某些情况下以武装对抗的行动方式进行，或以技术手段及知识产权模式牵制限制议价能力，在信息不对等和新兴传媒手段、政治言论削弱他国民众对本国政府的合法性认知和信任基础。从 Harold K. Jacobson 的文章《美国和联合国系统》中 1965-1987 年美国与联合国的关系结合斯蒂芬·吉尔《大西洋竞争和苏联解体》中对冷战的分析，民主政治在国家间的经济问题（地缘经济和金融能力）上议价能力是弱于中央集权体制的，因而也造成了美国在资本和地

缘经济发展上的威胁感知。言论自由对民主政体最大的贡献在于信息的全面全方位获取和整合，因而也体现在 Ellen Alderman 和 Caroline Kennedy 合著的《In Our Defense: The Bill of Rights in Action》第一修正案的故事之中。在商品经济层面民主政体的环境和竞争资本主义营造了人的议价能力和说服能力，同时也形成了民主政体相对于中央集权体制在市场（商品）经济上的优势。

1.7 正文结构和创新

本文主体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

本文第一部分主要是对建国前由大航海形成的殖民主义与重商主义的西方中心全球化的回顾。西方文明通过海洋进行的全球化以权力政治为手段，并在破坏性的发展中形成了另一种文明复合体。在这种文明复合体的残酷斗争中形成了近代政权的更迭以及现代国家的形成。现代国家的残酷性并不仅仅在于它是如何形成的，同时也在于它在形成过程中造成的对人的戕害。本研究将全球化概念视为“果”，以中华文明的内生性发展探讨和梳理主权观念问题，而不是以威斯特伐利亚延伸为基础概念的主权。

本文第二部分以对规模化市场主导下工业文明对中华本土传统文明主动性衍变的角度，解析两岸关系和民主运动的实质。现代文明发展以自然权利为代价，工业发展的便捷性改变了传统权力之所在但并不确保文明的共处。传统文明和文化在工业裂变下造成的撕裂在当代以旗帜标志和契约理论形成了人文历史统一性的嬗变。它不仅是主观或客观认同的问题，同时也是全球利益分割格局和占有所致。历史实践的形成和文明间性的脉络是本研究在此溯源的对象。这种动态因的弥合需要通过长期的发展与并轨逐步达成，它的变量是全球多头博弈主体和客观时间随实践的变迁。

本文第三部分以认知论的创新进行，并通过对认识的改造改变感知。祖国的统一是多方面、多维度、多层次的动态整合，科学发展和学科发展，本体逻辑和逻辑本体的辩证。全球化的实践是保罗万千的流动，变化万千的蜕变，支柱世界的互立权力（power）、轴心。效用主义下的生产配合产生品的流通（贸易）构成全球劳动分工，知识的生产形成识知空间化固，生物意味上的主观和逝流时间。知识之光需要生命之重予以巩固，稳以光之识知不易。类人是差偏，物质的创造与设计同会因旧腐离偏钝化。在去殖民化、国家主义话语中全球化的哲学是本文

研究回答的第三个问题。

IJSER

2. 重商主义全球化

2.1 由大海与商贸构成的全球化

史景迁认为明朝晚期是中华文明成就的巅峰，但其对海外利益的开发（overseas venture）和世界知识获取的缺乏将其王朝断送。³加文·孟席斯则在其论证中指出了相反的推断。1405年明朝朱棣开启了中华民族帝王时期的全球海上航旅。郑和的航线从北京出发，途经中国南海，横跨印度洋孟加拉湾，由阿拉伯海进入抵达非洲大陆索法拉，并从好旺角转抵欧洲。其中洪宝和周满的舰队由南美洲跨太平洋抵达澳洲，并分别由印度洋和印度尼西亚从中国南海和东海返京。其中周满的舰队在菲律宾分叉并由太平洋抵达北美西海岸。周文的舰队在洪宝和周满的舰队从加勒比到南美洲期间从大西洋途经古巴由北美东海岸抵达罗德岛（Rhodes Island），并深入北极。⁴孟席斯的推论中并没有详细资料支撑舰队的行动哪些属于官方任命（即作者认为的朝贡目的）哪些属于个体行为，在全球航旅上需要运用到的综合知识在古文明中是如何发展的也是不解之谜。中国（Middle Kingdom）传统文化和国家运作方式，及其法律模式有着强烈的道德二元论影响。中国的官方法律向来以垂直模式从中央作用于个体以保持历史常态，而非水平模式的作用于个体之间，并且有强烈的惩戒性，即法典模式。在治理体系上皇帝借由竞争性的科考制度选拔代理人以管理国家，其二元道德的差异、对人体的摧残，以及基本的公平性问题时常引发农业生产群体的起义。⁵保守主义和农耕传统的回潮，以及朝贡思维下的实用主义使得这段历史被推翻明朝的清政府否定。⁶顾学稼在《沙俄出售阿拉斯加原因考析》一文中指出了沙俄在贸易与领土扩张之间的战略动态。由英国清教徒和欧洲人组成的殖民者在北美洲建立的政府组织整合了许多此前分散的北美殖民地由此形成了西方文明意味的国家概念，即 state-nation，并由联邦政府行使权力。⁷⁸

³ Spence, Jonathan D.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M]. W.W. Norton & Company, Inc. 1991. Pp. 3.

⁴ Gavin Menzies. 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M]. Perennial, 2004. Pp 89-339.

⁵ Derk Bodde, Clarence, et al. Traditional China[M]. Edited by James T.C. Liu, Wei-ming Tu. Prentice-Hall, Inc. 1970. Pp 68-108.

⁶ Gavin Menzies. 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M]. Perennial, 2004. Pp 82-84.

⁷ 顾学稼.沙俄出售阿拉斯加原因考析[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03):101-112.

⁸ Ellen Alderman, Caroline Kennedy. In Our Defense: The Bill of Rights in Action[M]. Perennial, 2002. Pp 15-17.

商业的垄断是帝国重商主义的基础，对比以贵金属形成的纸币文化而言。从既有结构体系的建构角度美元与黄金的挂钩有助于通过现有优势进行商品贸易。美国联邦储备系统（Federal Reserve System）的建立帮助了美国联邦从金本位的国际贸易体系抽离。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建立使得主要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贸易可以继续延续着封建银行和军阀地权体系延续而相对不受战乱的影响。⁹1912年民主党决定利用（capitalize on）中国问题并推进完全外交承认。在美国民主党 Wilson 赢得选举后他将国际财团的钱取出并以压榨性条款贷款给袁世凯。英国对美国行为非常不满因为袁世凯还未正式给与大不列颠外国权利与投资，包括其对新疆自治化的诉求。1928年夏美国驻华大使与宋子文在北京签署条约使美国同意中国（Jonathan Spence 在其文中以阴性的“her”代指）制定外国进口品关税，并在华盛顿的意见中构成对国民党政府的事实性（de facto）和法理性（de jure）承认，彼时的中国已成为世界工业力量的潜在市场和廉价劳动力，同时美国资本对华投资的信心在宋氏家族与蒋介石的姻联中得以加强。一贯以幕后工作为主的孙中山早年混迹于（并且中华革命党亦是）国内外地下组织，其对军队向来没有直接领导力。对军队有直接影响力和控制力的蒋介石成为金融势力和寻求庇护的地下组织（青帮）的拉拢对象。上海美国商会和中国银行均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北洋政府时期外国势力在华利益主要集中于上海、满洲南部，包括香港广州沿线铁路、水路运输、煤矿、制造业、地产、公共服务等。第一个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1915年开设于上海，但美国本土对当时的共和运动更为同情（sympathetic）。¹⁰从反建构层面黄金货币本就出于对既有体系的妥协与误读，它仅仅是出于一种基于现实利益的判断。结合孙中山的军事政权民族主义意识形态（nationalism）的军队化在蒋介石校长和黄埔军校的共同协作中开启了新的由个人号召力领导的异于北洋军阀传统价值观引导的军政革命模式。

以海洋向内陆文明的渗透标志着全球殖民主义的开端，没意识到这个趋势的北洋政府期冀通过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获得领土承认，蒋介石政权通过与希特勒德国达成工业军事协定获取民族工业发展，这都是历史的信息不对称和民族主义

⁹ Gustav Stresemann. The Economic Restoration of the World [J/OL]. Foreign Affairs, 1924.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924-06-15/economic-restoration-world>.

¹⁰ Spence, Jonathan D.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M]. W.W. Norton & Company, Inc. 1991. Pp. 281-283.

政治造成。在军事能力和财政能力的绝对劣势和出于权力稳固的需要，段祺瑞在顾问的串掇下为取回德国在山东青岛附近的特许权（concession）考虑加入英法联盟军；加上美国的施压以及日本的贿赂，段祺瑞与德国断交并最终宣战。英法虽并不看好中国的兵力，但联盟军需要中国的人力，并在段祺瑞宣战前即开始交涉，将一批中国劳工送到码头与建筑项目，以便更多欧洲族裔入战。山东劳工从英国位于威海卫的海军基地附近从印度洋穿越苏伊士运河至法国政府。由于被德国潜艇击沉，新招劳工从太平洋运往加拿大转火车运输，并由战舰与反潜护送穿越大西洋抵达法国北部。中苏关系由于有较大面积内陆接壤在海洋问题上分歧较浅，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国共两党的合作在客观历史条件下形成了一定的抵御能力。

2.2 殖民主义下的民生问题

以贵金属形成的纸币文化影响了帝国古代文明以及文明间的互动。十九世纪中叶满清末期，上千万人因国内震荡而亡或无家可归，第一波美国移民潮始于1848-1849年加尼佛利亚淘金热（gold rush），同时也是三藩市（San Francisco）的中文名“金山”的由来。由于西方白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以及华人在美的社交关系的不同，种族主义白人工人群体及其政治支持者刻意煽动，并于1849年爆发为暴力事件。在对外事务上，清政府将美国海外华人定义为劳工，而在美国相关人士眼中，由于不熟悉（unaccustomed to recognizing）海外华人在美的权利，清政府反应缓慢，即使总理衙门知晓（aware）相关事宜。反华政治压力从加州蔓延到华盛顿特区，1880年清政府被说服（persuaded）同意新的协议授权美国“管理、限制或暂定”中国劳工的流动如果美国政府认为此限制“合理”，这是王朝政体对美国政体的政法体系不通所致，如果其政治合理性和道德观不谈。1882年在美国总统 James Garfield 被暗杀后，新上任的 Chester A. Arthur 决定十年内不否决中国“劳工”移民，强迫（forced）所有在美华人获取特殊登记，并不允许获得美国公民身份。1884年他接受了进一步立法扩大化“劳工”的用语（term）以囊括“毒贩、商贩和渔民”并将限制适用于所有“华人种族”无论其是否为清政府臣民。西藏作为中国富有稀有金属的矿产产地亦无疑是全球政治和国内政治的聚焦点之一，尤其是涉及到中国悠久的矿业控制的纸币文化。对于

大不列颠而言也影响着对殖民地的军事控制能力。¹¹¹² “正是为了上帝和黄金，西方人在 16 世纪向外征服世界。”¹³以传统农业、纺织业、手工业等为主的传统中国在以西方文明（Western civilization）为主的重工业侵入和利益强占下，中华内部文明事务遭受了重大影响和重创。地理属性虽对传统人文、道德观念的塑形有所影响，较之（contrary to）交通、通讯工具等改变基础地貌的活动和发展，但后者无疑对前者的正常以及长久活动造成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特别尤其是如果后者活动的驱动性因素是为大批量获取和运输前者的活动成果而言。（此论断更多基于工业发展的动因、本有地理交通限制因素，和帝国王朝惯性使然等综合因素的判断：欧美对中国茶叶、瓷器、丝绸等货物的大量需求以及中国对欧美工业制品和原材料的兴趣索然导致大量银币流入中国，大不列颠为持续获得中国货物且在不愿以原有方式交换的前提下向中国大量运输和销售鸦片。对海外利益的贪婪和不折手段加之中国既有政治模式的问题致使众生及文明基础实践者的灾祸及条约体系（treaty system）的建立。）¹⁴

大不列颠之治（Pax Britannica）是重商主义全球化的典型范式，国际联盟的建立进一步的深化了文明外部对中国的影响。流落海外的华人并未获得应有的生存尊严，本土华人领土基本权利不受西方势力尊重和认可，这同时也是殖民主义的标志行径。盎格鲁民族的组织性民族权力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物进化学说的泛化使用下形成了对强权的辩护，并在五四运动文学中的文字作品呈现某种投射。五四运动在西方世界更多被理解为新文化运动（new culture movement），在本土政治而言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传入的意义更多在于保护本土弱势群体在暴露于工业文明中的经济脆弱性和封建制度对人的摧残形成的政治脆弱性两者之上。西方哲学的引入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标志客观的形成了中西文化意识的交流性，但客观认识的文化间性理解并未真正形成。民族国家间的关系发展仍然是历史情境中的主要研究对象。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彼得·奥尔特的民族（国家）主义研究。他将文化民族（国家）、政治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意识、民族（国家）建设为切入模式对统一性的国家概念进行解构，并将“民族（国家）作为中

¹¹ Spence, Jonathan D.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M]. Pp 212-244.

¹² Gavin Menzies. 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M]. Perennial, 2004. Pp 81-85.

¹³ 周琪译，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M]. 新华出版社，2013-01.

¹⁴ Spence, Jonathan D.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M]. W.W. Norton & Company, Inc. 1991. Pp. 128-164.

心价值 (the nation as central value)”进行了批判 (critical) 研究。¹⁵中心-外延的国家政治模式在理念上更类似于彼得·奥尔特对国家主义的定义，也正是如此史景迁在阐释这个政治观念时的用词是“弱化 (curb)”和“外国势力 (power of foreigners)”。城邦制共和国在短效上虽能平息争端，但从长期而言缺乏人文解放和主动性政治进步。史景迁的论断从这个观念而言更类似于高位政治的祈使语态 (imperative)。也因而史景迁认为也许孙中山真正的遗产 (legacy) 是本土国家主义 (indigenous nationalism) 可召唤苏联专家组织技术 (organizational expertise) 建立有意味的政治行动。¹⁶

2.3 前二战的多边主义

前二战的多边主义是民族国家的多方权力制衡。权力在这个意味上很大程度特指硬实力，这也是性别政治 (gender politics) 在文化常态中的作用结果。袁世凯去世后段祺瑞的北洋政府派遣劳工进入欧洲战场可算是一种事实性多边主义实践，在华盛顿意见中法理 (de jure) 和事实 (de facto) 认可的国民党军事政权与纳粹德国进行军事工业协定中也构成多边主义实践。多边主义在全球政治实践中的中心点在于军事触及能力。九国公约以现代国际法原则确立中国的主权独立以及政府和领土的完整性 (integrity)，新文化运动使当时的中国与欧洲民族国家形成文化间性交流，西方哲学的引入通过书面语言的第二代延伸 (second-generation extension) 扩展了跨文化交往。¹⁷但在主权民族国家间的协调、协作中区域化的集中或突出性势力的壮大是美国保持统治地位最大的忌惮，信息的持续获取是美国保持警惕的重要手段。从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公开档案角度看至少从 1939 年 10 月 11 日罗斯福收到爱因斯坦 8 月 2 日寄出的信作为美国得知纳粹德国的巨大潜在威胁的最晚时间。如果排除当时可能的其他情报，至少最晚在 1939 年 9 月 1 日罗斯福从白宫收到驻巴黎外交官 William C. Bullitt 的电话称德国进攻波兰并轰炸了几座波兰城市时罗斯福得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战略均衡被打破，纳粹德国在核能上的技术性突破并未受到凡尔赛条约对其空军发展制约的影响。1941 年 12 月 7 日罗斯福午餐时得知日本袭击珍珠港和其他

¹⁵ Peter Alter. Nationalism (Second Edition)[M]. Hodder Education Publishers. 1994.

¹⁶ Spence, Jonathan D.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M]. W.W. Norton & Company, Inc. 1991. Pp. 334-341.

¹⁷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Books on the Far East Since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J/OL]. Foreign Affairs, 19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922-12-15/books-far-east-washington-conference>.

太平洋设施后，美国总统罗斯福指示起草预于第二日国会联合环节（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的演讲。在对打印稿的亲笔修改中，他将军情的时间感知和空间区块隐去并以短效、突发性、价值判断引导的词汇替代，并加入了以受到屈辱的经济利益语汇（solicitation）谈及与日本政府和天皇（日本人）在太平洋持续和平的对谈。在地点的推进上，罗斯福在讲稿开始部分以“欧胡(Oahu)”代替“夏威夷和菲律宾”，将“马尼拉和欧胡”改为“夏威夷岛”；在演讲的视频资料中罗斯福在“马尼拉”后进一步加入了香港、关岛、菲律宾岛（手改稿原定是有的）、提维群岛，以及当天新得知中途岛。在对国家记忆的塑形上，罗斯福在宣誓自己作为军队和海军总指挥后深度加入了带有屠杀和侵略意涵的字眼、发音上和“家”以及“全”混含的定语修辞“国(nation)”，并删除“country”概念的“国”，以激发(address to)受众的主观正义力量感(righteous might)，并在陈述“敌意是存在的”后在人民、领土、利益的字眼上强调(accentuate)“我们的”定语，最后宣布美国和日本进入战争状态。罗斯福在美国国会涉及远东战略的演讲结束后不久丘吉尔访问华盛顿。为了外宣的目的罗斯福说服丘吉尔将英国殖民地列为分别的国家(nation，即民族国家)，形成了由北美东海岸为核心连接西欧、东欧水域、南非、中国和苏联的网络，即大西洋宪章，誓意打碎德奥意三国同盟条约的历史延续性。在对国际联盟的替代组织联合国架构的设定上罗斯福将美国、大不列颠、苏联和中国列为“四警察”。在福特主义的遗产和英美盎格鲁文化共同的体系价值观暨大西洋宪章的整合帮助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了对战事的后发优势。

特鲁门下令对原子弹的使用是日本而非纳粹德国，这显示出美国（或者英美同盟）当时更为看重的还是海权优势以及贸易优势，而不是在于正义观念的考量（或也可解释为出于文化和地缘、科学发展的同源性纳粹德国对于联盟国更可控）。这也是大不列颠和美国对北洋政府更多需要的是外交承认(diplomatic recognition)，而在西藏和新疆的统一问题上不仅频繁与中国抗衡，还包括派遣情报机构培养反动势力，以连接从零时区到东八区的布局。海权的巩固意味着可以通过南方政府和三民主义政策更多的从中国输送密集资源，巩固中国美国商会和大不列颠在华实体利益，以及大不列颠共同财富体系。¹⁸而在战后利益规划上

¹⁸ Spence, Jonathan D.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M]. W.W. Norton & Company, Inc. 1991. Pp. 281-283.

第二次魁北克会议后丘吉尔访问罗斯福于海德公园的家，决定同意将核武器研究保密，并首先用于轰炸日本直到其投降，且事后两国政府继续军事和商用目的的开发合作除非且直至终止合约。俩人还确认了需调查玻尔教授的活动并有措施采取以保障他不泄露信息，特别是对俄国人。从工业利益和土地利益角度美国对俄罗斯的限制是通过单边贸易和技术限制保持阿拉斯加州的安全利益。

2.4 小结

正如史蒂芬·吉尔认为“多边主义可被定义为政治手段”，全球军事部署（global hegemony）并不在于某个国家（state）轮庄霸权，而是基于“承诺于（committed to）某种控制概念的社会力量的跨国联盟（transnational coalition）”；传统帝国主义（classical imperialism）可被看做是国际自由主义（International liberalism）和国家垄断（state-monopoly）一争高下（vied for supremacy）的时代。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和布莱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形成了供给侧经济学和银行金融体系的霸权，其主导思想延续至曼昆的宏观经济学之中，并塑造了盎格鲁美利坚银行体系的特征。¹⁹同时在资本主义市场和工业的发展中美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和资源储备由此得以建立。²⁰德国以工业集团与银行挂钩并有着强势的国家介入色彩，因而也形成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争论。²¹全球资本的角逐和对劳动力的动员构成了彼时军事部署的基本目的。自然资源的可能性是支撑工业文明的基础，凡尔赛条约的签订虽被看做是国际法使然，实则是资源-金融-资本-工业-市场的联动作用。²²也正是在工业资本主义立场和既定思维模式（presupposition）下，史景迁认为清朝的问题在于平衡中央和地方权力，由北京作为中央到周边（center and periphery）的政府综合体可以将中国建立为议会民主制的现代国家（modern nation-state）。²³

¹⁹ Kees van der Pijl. Atlantic Rivalries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 Globaliz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Multilateralism[M]. Edited by Stephen Gill.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97. Pp. 196-201.

²⁰ Etienne Balazs . The Issue of Capitalism in China/Traditional China[M]. 1970. Pp 50-58.

²¹ 高红明. “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波洛克与诺伊曼之争[J]. 学术界, 2018, 244(09):48-55.

²² Spence, Jonathan D .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M]. W.W. Norton & Company, Inc. 1991. Pp. 325-333.

²³ Spence, Jonathan D .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M]. W.W. Norton & Company, Inc. 1991. Pp. 271.

3. 现代化与文明的终结

3.1 规模性市场工业对文明的终结

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分离了国家（state）和信仰，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工业与规模性生产形成了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和国家间（interstate）秩序基础。《传统中国》中 Etienne Balazs 的文章《资本主义在中国的问题（The Issue of Capitalism in China）》明确指出当时自由企业制在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前早已不存在，效用主义经济中机器的目的就是节省时间或劳动成本（economize time or labor）。²⁴苏维埃政府的经济混乱以及工业国家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冷淡致使列宁于 1919 年成立第三国际。在第二次共产国际议会前列宁即派出 Grigori Voitinsky 和杨明斋研究组织设立共产党。两人于 1920 年通过在北京大学教授俄语的俄罗斯移居者（émigré）认识李大钊，并被建议结识了陈独秀。陈独秀于 1920 年 5 月在上海召集组织了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激进派和国民党组织人士成为潜在的共产党员。而如胡适等更倾向于自由派（liberal）的支持者自《新青年》后放弃了对陈独秀的支持。毛泽东在北京、上海讨论全译本的《共产主义宣言》和其他马克思的书籍。在其工作期间与国民党有影响力官员的随行人员的接触使其名被党领导所熟知，并被邀作为湖南代表参与 1921 年 7 月上海第一届共产党全席会议。在 1919 和 1920 期间来自长沙的毛泽东的密友，周恩来和邓小平则去了法国的工作学习项目。两人在法国加入共产党，并成功招募了不少欧洲华人。瞿秋白则于 1922 年在莫斯科加入共产党。1922 年 5 月从法国归来的李立三与被送往莫斯科学习的刘少奇在安源煤矿和大冶钢厂开始工人组织。类似组织在中国城市遍地开花，并常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形成了英国资本与中国工人的对抗关系。工人组织的反抗伴随着暴力镇压和杀戮。在传统性税收和军事政权所代表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双重挤压下传统文明破裂，部分存余于人文层面。²⁵²⁶“三级世界”的理论正是对国家资本主义在全球扩散的精炼概括。

主权原则虽然在名义上确立了民族国家的土地利益但并不代表领土范围内的人能真正平等享有其利益。国际组织作为民族国家间的管理组织通过对优势元素的定义与规范形成超越国家主权的全球体系，并通过市场的植入制造可供资本

²⁴ Etienne Balazs . The Issue of Capitalism in China/Traditional China[M]. 1970. Pp 57-58.

²⁵ Etienne Balazs . The Issue of Capitalism in China/Traditional China[M]. 1970. Pp 57-58.

²⁶ Spence, Jonathan D .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M]. W.W. Norton & Company, Inc. 1991. Pp. 424-431.

支配的世俗化民族国家，即《传统中国》中所说的“资本主义感知”。现代性的介入通过复合主义（pluralism）将垄断化优势割裂下的碎片进行整合。1920年代中后期美国对华政策保持低调，美国官员细致观察着共产国际的初步成果，并普遍赞成蒋介石击垮成长中的共产党红色力量。为防止革命利益引发暴动并毁掉上海的特许区（concession area），美国对1927年间汉口和南京的国家主义兴起持观望态度。共军的北上进一步增添了中国政治的不确定性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²⁷世俗化（secularize）不仅是人文和生活的“世俗”和“正常”感知，同时也在于空间管理的区块化、模块化，甚至可以是资助军事政权（military regime）的方式。美国新教徒（American Protestant）的神学（theologians）和宗教人物在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建立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正如宗教在美国政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因而在全球治理的假定模式上考克斯以“等级制（hierarchical）”定义。^{28,29}Adrian Pabst 认为在转变古代中国封建帝国建制上孙中山政权的天主教工具理性被共产党以儒、道、佛三教边缘化，但实际上中国的大量本地人口包括领土周边人群的文化联系都是以这三种精神信仰形成。佛教和道教连接了长江和黄河流域文化，是中印区域的人文交流基础和西藏地区稳定的基石。在语言沟通机制上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内涵和可沟通性更强，更加适应地区稳定可持续发展建设。受东正教影响较强的北方和伊斯兰教的边疆人文区域也并不符合美国西海岸盟友的主观区域规划。而在自古就形成的一些非官方人文流通也并不符合救世情怀（messianic streak）的主观认知和感知。也由此在共和国运动中的现代化在 Adrian Pabst 看来中国、俄罗斯、土耳其、拉丁美洲的大部分、东西欧过渡区形成了现代价值的反命题。由大规模和高速运输、战争手段形成的殖民主义和宗教文化变迁源根在信息和传媒技术与艺术的官僚理性（bureaucratic rationality，在此特指“传播”概念）中配合价值体系经济手段改变着全球社会的宗教光谱性（spectrum）弥散。圣公会教系对全球沿海和中东地区的影响扩散、二战欧洲战场服务于基督教青年会的晏阳初在平民普及教育中对码头文化区域的影响、包括医学体系的变迁以经验（empirical）的方式改变着中华本土文明实质，但也同时

²⁷ Spence, Jonathan D.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M]. W.W. Norton & Company, Inc. 1991. Pp. 418-424,.

²⁸ Adrian Pabst. *The Paradox of Faith: Religion beyond Secularization and Desecularization: // The Deepening Crisis: Governance Challenges after Neoliberalism*[M]. Edited by Craig Calhoun and Georgi Derluguia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57-181.

²⁹ Robert W. Cox. *The New Realism: Perspectives on Multilateralism and World Order*[M].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xvi.

致因于区划间暴力性文明冲突。蒋介石曾以保甲制度即对人的物理法则进行冲突镇压但无疑凸显其政治智慧的缺乏和官僚思想遗馀。

3.2 熟识化记忆与文明

工业化理性导向的发展趋势和全球国家 (state) 体系与信仰的分离使得文化成为熟识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技术理性在目标导向的劳动中改变着人文理性和本体认知。媒介触及率在传媒和互联网的发展中形成了传统地缘实体权威关系在全球化的虚拟世界中形成多维度平行现实, 并在贸易的全球化影响下改变着实体文明区域实践和主观感知及客观可观察的社会现实。在对文明的感知改造上美国公司通过颁布知识产权规则大量向西欧出口好莱坞和摇滚乐, 并限制国外文化产品进入美国市场。³⁰1902-1936 年间华外资本普遍增多的前提下, 前苏联资本从 1931 年顶峰时期的近三百万美元骤降为零; 希特勒与日本 1936 年形成“反共产国际公约 (anti-Comintern pact)”。史景迁的文献中常以“苏维埃集团 (Soviet bloc)”指代中国共产党。日本帝国通过跨国银行体系和国家干预 (state intervention) 式的工业发展积攒军事能力, Kees van der Pijl 在《大西洋敌方和前苏联解体》中以及邵俊敏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工业经济分析 (1927-1937)》中均有所涉及。由凡尔赛条约失去了其在华利益的德国, 随之失去了对法国、波兰和丹麦的控制致使其放弃了所有殖民地。德国贸易的下滑同时也导致其货币对美元的大幅度贬值, 直至其成为国际联盟成员 (full member), 并随之作为技术专家帮助国民党西山派, 与国民党政府达成军事-工业协议 (dealing)。蒋介石对德国的工业依赖基于资源集中型发展但并不知当时德国的技术突破 (核能力潜能), 也因而在史景迁的历史描述中希特勒对蒋介石的回应是“懒得回应”。曼哈顿计划和第二次雅尔塔会议是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均不知情的前提下进行的, 国民党方面魏德迈 (Wedmeyer) 问询日本投降后其角色从华盛顿获得的指示是他应 (should) “尽量帮助国民党但不要为他们 (on their behalf) 介入内战”, 并应 (should) “帮助中央政府迅速转移军力 (forces) 至中国重要地区”。³¹³²而在转

³⁰ Ravi Sundaram. Global Governance after the Analog Age: The World after Media Piracy // The Deepening Crisis: Governance Challenges after Neoliberalism[M]. Edited by Craig Calhoun and Georgi Derlugia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83-201.

³¹ Spence, Jonathan D.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M]. W.W. Norton & Company, Inc. 1991. Pp. 482-485.

³² 麻玲. 从史迪威、魏德迈和赫尔利在华活动看太平洋战争后的中美关系[J]. 社会科学战线, 2005(05):326-328.

移区域的上海、釜山、大沽、广东、青岛顺序上可见其核心考量仍是亚太战略。从战略权重分析英联邦的影响成分较大。

工业理性以效能、人员管理、产业链分布通过市场机制的植入形成市场原教旨主义政治经济关系下的传统社会人间（intrapersonal）错觉，并通过法律形式强化感知到的眼前现实。这正是苏珊·斯特兰奇所说的“科技、金融、信息和传媒领域的结构转型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强于全球政治”，即“权威（authority）和市场之间的基本关系”。在机构化的区块结构（secular structure）和逻辑结构形成的沟通范式中，国民党政府倒台前蒋介石和宋楚瑜仍然冀希望于经济货币政策，但实际上国际联盟从不是以蒋介石自认为的组织理性运作。军队被银行和市场腐化是国民党失去本土执政根基的问题所在，同时也构成中国共产党植根本土执政的特点。在赫尔利大使（Ambassador Patrick J. Hurley）写给杜鲁门的辞职信中，赫尔利指出时值美国的国外政策在宣布的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做法之间的不一致形成了其“惊人特征”。在国家公务员（statemen）公开预测民国政府倒台且中国军队（笔者资料搜集范围内的原文并未特指某军系）解体时期赫尔利被指派到中国，罗斯福总统指示其“防止政府（the government）倒台，并保持华人军队处于战争状态（keep the Chinese Army in the war）”。³³史景迁在其对华历史巨著中称“在赫尔利给杜鲁门总统的尖锐（sharp）的辞职信中，赫尔利称述美国对中国的民主理想（democratic ideal）被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两股势力所威胁”。³⁴赫尔利信中同时也深入的透露了美国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在当时的对华政策中分歧较大。在国共和平谈判中赫尔利的任务遇到的最大的障碍来自重庆使馆的美国职业外交官和美国国务院中国和远东部门之中，并认为在外交层面“我们正允许我们被卷入一个以殖民帝国主义反对共产帝国主义的权力集团（power bloc）中”。³⁵也正是在组织理性和目的理性的前提下肯尼迪在 1949 年 1 月 30 日的演讲中称：“有人称中国共产党并不真正是共产主义，仅仅只是升级版没受莫

³³ Hurly, Patrick J.. Resignation of Ambassador Patrick J. Hurley;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Certain Charges Made by the Ambassador [DB/OL].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Library.

<http://images.library.wisc.edu/FRUS/EFacs/1945v07/reference/frus.frus1945v07.i0010.pdf>.

³⁴ Spence, Jonathan D.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M]. W.W. Norton & Company, Inc. 1991. Pp. 482-485.

³⁵ Hurly, Patrick J.. Resignation of Ambassador Patrick J. Hurley;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Certain Charges Made by the Ambassador [DB/OL].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Library.

<http://images.library.wisc.edu/FRUS/EFacs/1945v07/reference/frus.frus1945v07.i0010.pdf>.

斯科指示的农民运动。听一听博尔顿报告：‘它的教条跟随列宁和斯大林。它的领导是莫斯科培养的（35 个报告内列出的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中一大半要么在莫斯科呆过要么在莫斯科学习过）。它的政策和行动，战略都是共产党人的。中国共产党忠实的跟随克姆林宫的每一曲折行径站队了一代人。’”³⁶

3.3 文明作为社会人的“三一律”

大英帝国之治（Pax Britannica）在开拓海外贸易市场并从他国（state）和社会控制中解放劳动市场和工业生产的同时也为自己填埋着全球不安定因素。³⁷在利益的斡旋中德国资本在美国的影响转强的同时即限制了大不列颠在东亚和印太的潜在能力。³⁸列宁于 1917 年发表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论证资本家们为安抚国内工人劳资关系与提升生活质量将会剥削海外资源和人力，并引发世界革命，这也符合《传统中国》中的学术倾向。盎格鲁文明对全球知识的获取与发展形成的地域信息等时和跨文明信息不对称通过物质性约束、胁迫等多种手段塑造了全球体系。身份的强化、认同、塑形、演变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要素，赫尔利归国的相关文件得以显示其部分现实。外空和航空领域的发展以及个体设备的发明使对个体的人的时间空间有了更强大的掌控。Harold K. Jacobson 认为美国对联合国系统的掌控权可以国家生产总值（GNP）解释，但这并不完全符合现实。后二战全球体系的建立是国家间（interstate）权力政治和现实政治作用结果，并通过外交史研究形成民族国家间（“国际”）关系学科，并从国际法和国际经济中解除束缚形成政治权力，“铺设法律和经济轨道”。³⁹换言之市场和经济是非战争手段的国务与市场（state and market）权力目的。这个在冷战中得以显现。Kees van der Pijl 分析了 1930-1983 年间德意志银行寻求独立于大不列颠和美国的与前苏联的联合。盎格鲁撒克逊银行体系相较于国家工业管控严格的银行体系所体现出的脆弱性使德意志银行在美国形成了市场优势。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和德意志银

³⁶ John F. Kennedy. REMARKS OF REPRESENTATIVE JOHN F. KENNEDY AT THE PHILIP J. DURKIN TESTIMONIAL DINNER[D/OL]. SALEM, MASSACHUSETTS, 1949-01-30.

<https://www.jfklibrary.org/archives/other-resources/john-f-kennedy-speeches/salem-ma-19490130>.

³⁷ Kees van der Pijl. Atlantic Rivalries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 Globaliz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Multilateralism[M]. Edited by Stephen Gill.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97. Pp. 196-201.

³⁸ 杨东. 再谈滇缅公路的关闭——英国外交部决策过程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3, No. 185 05 114-119.

³⁹ Robert W. Cox. The New Realism: Perspectives on Multilateralism and World Order[M].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xv.

行在东欧基建上的合作倾向致使德意志银行行长接连被暗杀并栽赃到红军旅。荷兰王子 Bernhard 通过世界野生动物基金售卖美国飞机至欧洲被查事件也显现出美国对技术能力优势的保护性。

概念通过抽象以传统人类记忆的角度而言获得某种非主观属性，之于当代从科学角度定义文明就是基于制高点的可被观测、抽象、量化、计算的那部分的整体。它是一种通过可控性实践形成的权力，即控制概念。这种控制概念使得国家间（interstate）权力政治在物的实践上更为可控和具有可操作性。美国的远东战略和联合国的建立均是持续性的，也因而至今美国企业仍以大中华（Greater China）和中国大陆（China proper）进行划分。二战期间的国民党政权作为罗斯福钦定的“四警察”之一是美国远东政策和印度支那战略的基础部分。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员并没有如部分美国政客所担忧的被苏联化，但也由于前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连系以及一边倒政策的影响使得中国和盎格鲁体系在远东问题上难有一致性。正如 Hassan Hanafi 的分析“信仰在发展中国家扮演的角色正如发达国家社会科学扮演的角色”，西方中心的多边主义外表由“深层次的单边主义中心到外延的关系”构成双重性。⁴⁰其分析的前部分同样适用于文化之于国家传统部分。文化作为一种思想体系部分构成人文性意涵，由而作为内生本土性而言即文明。“三民主义”的历史民主思想的文明间性实质是美国东海岸的岛链延伸。文明间性自古存在，封建王朝通过姻亲关系形成治理和物质关系的朝贡体系，毛泽东在反封建革命中高举的口号是“一人一妻”，以土地改革作为主要政治纲领等形成了对传统社会文化的瓦解力量。但对政治进步的诉求和历史实践的常习所造成的毁灭性往往是难以估量且滞后显现的。盎格鲁文明和中华文明同样经历了上千年的衍化和发展形成了当代体系和组织图景，也由而从这个角度而言文明即政党的组织外变量。也因此任何形式的民主均实质构成组织外附庸。蒋介石退往台湾岛后麦克阿瑟将其军事政权定性为美国岛链和空军基地的一部分。蒋介石对美军的附庸同时体现在其积极加入朝鲜战争，虽然麦克阿瑟并没接受。⁴¹

3.4 小结

后二战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作为文明间性意识形态构成了盎格鲁文明政治-经

⁴⁰ Hassan Hanafi. Multilateralism: An Islamic Approach[M]// The New Realism: Perspectives on Multilateralism And World Order.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97. Pp 110, 120.

⁴¹ Spence, Jonathan D.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M]. W.W. Norton & Company, Inc. 1991. Pp. 529..

济/军事-生产和权力控制中的全球文化。考克斯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多元终将被全球娱乐产业消灭成为民间传说，以如苏珊·斯特兰奇所使用的“商业文明”作为“完美合法性”术语，构成后威斯特伐利亚、后全球军事部署、后全球化本体。但笔者并不认为这种后全球化是一种“文艺复兴”或者“持续的和平”之类的理想性标志，其实质更是一种技术-生产-市场资本范式的阀限所致，由边际利益主导。文明和文化作为政治手段正如权力互赖理论（power interdependence）之于全球政治，构成全球结构转型和价值体系重构的因变量部分。台湾社会和日本文化的结合形成了美国历史塑造的“民主”政权体系的一部分，正如后冷战美国在苏联扶植起的叶利钦政权。⁴²⁴³全球权力在世界政治经济穿透所形成的物理空间中的社会裂痕形成全球经济秩序下的文明真空和区域性不稳定因素，即便这部分因素在短效内能通过军事权力认同和安全感获取得到部分抵消。党派政治在传统地域范围内的兴起虽然从建构意味上形成了现代国家的架构，但从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的实质而言国家无非是权力的子系统，正如郭艳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国家认同》中的分析。在非洲和中东战略上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由于在战略上对美国的依靠致使国民党政权的最终沦陷。

⁴² Spence, Jonathan D.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M]. W.W. Norton & Company, Inc. 1991. Pp. 454.

⁴³ Kees van der Pijl. *Atlantic Rivalries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 Globaliz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Multilateralism*[M]. Edited by Stephen Gill.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97. Pp. 216-217.

4. 超越意识形态的海洋

4.1 中心与外延

中国人的务实和对口头承诺的重视在汉语版《追寻现代中国》中尤有体现。孫中山在那个年代特殊的经历以及多重身份口译者拿捏到位。但在“种”“族”等用词上难免落入传统思维模式之中。在“中国”的意涵上丝微史慎。“保甲制度”在此版本中被用于说共产党统治区的使用。在1984年Norman A. Wulf发表的文章《Outer Space Arms Control: Existing Regime and Future Prospects》中作者将外空活动与盟友间（inter alia）高海（high seas）活动对照。郭艳从“外部合法性”角度阐述发展中国家认同与危机并提出的解决对策在理式上延续了西方复合主义（pluralism）思维，在实质上秉承着军民融合发展的战略思维模式。这是工业现代化文明的典型国家范式，在全球金融体系定义的“国际常态”中是自由企业制和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组织原则，是对应用型产成品的商品经济流通。大西洋宪章是二战期间大不列颠和美国的盎格鲁文明优势元素最大化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福特主义遗产很大程度的决定了美国在全球体系中基于商品经济的霸权地位以及由此承载的全球军事部署。冷战期间戈尔巴乔夫应对“星球大战计划（Star Wars Project, SDI）”的失败体现出领导者个人意识形态对客观存在判断的偏差，实践理性、理论理性、基于实践的理论理性、基于理论的实践理性等各理性结构之间的偏差误判，特别是在文化属性上前苏联存在的意识跨度所致。信息技术和手段的发展以及其对知识生产结构的冲击深度影响着社会意识和权力结构。商品的跨行动交换（commodity transactions）通过对中产的意识形态（即信仰）的塑形形成金融的权力和跨区域流通链。也正是如此任何“外部”的合法性均是互赖权力（interdependent power）的一环。也正是如此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认为“祂者从不是目的（ends）只是手段（means）”。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将教堂与国家分离形成了国家权力（state power）压制神权（divine power）的现实，也因而对中产的意识形态巩固主要依托神学与外部信息对既定信念的巩固与加强，或者改变。

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作为发达国家私有部门（private sector）对发展中国家通过公有部门（public

sector) 的投资很大程度决定了作为主权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上所受到的限制。七国集团作为债权者的实体代表组成海洋载人、监测器械部署团, 即大宪章结构。台湾由于文化上曾受马关条约影响, 美国 1979 年对中国台湾的详述中暗含了日本和人文文化因素。⁴⁴⁴⁵在观点上本文较为认可温怡溢译於時報出版社的《追尋現代中國》序言中“至于一九四九年以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部分, 我们可以注意: 最近解密档案所披露有关一九四九年在莫斯科和一九五〇年韩战爆发时毛泽东与斯大林两人的关系; 可以被视为是逐步引向一九五七年的大跃进运动之不可抗拒的内在因素; 开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心理动机”的判断, 但從史景遷中文版序原文中可看出其理解更多處於口語言辭, 也正如他自我背景陳述。二〇〇一年一月二日于位于荷兰莱顿大学写序的陈国栋在荐书上论资排辈但并未意识到莱顿大学在海牙里 (in the Hague)。种族主义在時報出版中尤有显现, 青帮和「货币准备金」是国共党史中尤为重要一笔。太空与高海作为现当代重要战略优势和贸易对冲是全球政治和政治经济的首要中心, 盐海和内河则构成隐蔽一极。

4.2 宇之星辰下涛海

古远的星空递传航旅信号, 天語的古光映射涛海绚烂存文明迹踪。海基的十字路口萤绘光谱绕寰数字港湾。海倾宝岛衔接宙港与美空璞武飞扬。海洋文明丝缕浪湍苍居波岸。宇天回展方现土木故里。信息和人文要素是保护海航安全的必要渠道, 弑傲文化在海面和盘空要素间霞响着异域之琅。资本的赌场黯創海面徐嵬踉跄。陆基奔兩的机车和铁高蹿动运发, 行列盛盈。海洋淌流入江环育大地丰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海洋经济格局在新技术和环境保护需要的发展中逐转科学研究与人类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亦将成为主权国家科学发展的任责。发达国家的资本跨国与运营以国家 (national) 组织也由而成为海上贸易与经济的科学测量。也正是在此意味上经济和交易模式的发展将成为新的战略课题, 绿色经济的未来学术方向。存量 (stock) 经济交融新创技术与科学的仓石涓涓养滋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桥梁。邦邻粼粼波光照映华文交展系心未来。历史的海滩与星空之古远碰撞星斗光华, 水沧汇融。机构化的衔接以要素的通流和互换为本, 是连接国家间

⁴⁴ Spence, Jonathan D.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M]. W.W. Norton & Company, Inc. 1991. Pp. 454, 667.

⁴⁵ Spence, Jonathan D.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M]. W.W. Norton & Company, Inc. 1991. Pp. 671.

(international) 和国际交相发展的通道。内禀性的机动功能 (motor functioning) 和功能性实践认知的结合承载华光，润整着后二战地缘道路变迁中的文明成长。

陆海的变迁无不炼砺于以北约和大西洋宪章为契的西方资本主义联盟之重。苏联解体的历史复杂性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开放、体制改革的并轨在此过程中也遭受了巨大而惨烈的牺牲和代价。意识形态的挤压向来是现代文明发展进程中暴戾行滋生的头源，祖国统一循序渐进的进程亦趋随伴踈阻。人类命运共同体中非传统安全现显，国家权力 (liberty of the nation) 的发展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关键。⁴⁶国际化的人民币亦步亦趋加强着开放改革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在长远发展上联合国和北约的区块化分离以及非洲第三世界发展仍会是中美竞争布局的重要侧面。⁴⁸冷战和前苏联的解体是重要历史依据。卡拉·希尔斯通过乌拉圭回合以全球贸易的经济手段在保护美国单边市场的同时对凯恩斯集团施压，对巴西印度轴线贸易服务进行控制以维护其海洋优势。⁴⁹在跨国规划委员会上德国与前苏联的接近以及东欧合作发展德国所受阻力不断。为保障东欧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不受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GATT)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牵制，阿尔弗雷德·赫尔豪森的努力换来了一场政治暗杀，并被栽赃到红军旅头上。在其被暗杀几月后德国民主共和议会开设了世界最大的工业信托基金 Treuhand 私有化基金作为转轨资本主义经济的部分。Detlev Rohwedder 被指定为基金管理人。他对前苏联的政治妥协和经济依存再次引发了亚特兰政策制定者 (intellectuals) 的不满，特别是英美金融圈，于是在 1991 年 4 月 1 日被暗杀，再一次的被栽赃给红军旅。⁵⁰在大西洋势力集体致力于解体前苏联同时日本通过隐匿的军民融合发展以出口带动技术累积。⁵¹1991 年早期在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和国家安全局 (NSA) 得知前苏联有政变时，老布什政府随即决定为防止前苏联国家社会主义 (state socialism) 和促进对东欧的新自由主义改造不如帮助叶利钦上台。于是在 8 月亚纳耶夫政变时老布什指示将美国截取的情报给到莫斯

⁴⁶ Barack Obama. US-China Policy Under an Obama Administration[J]. China Brief Exclusive, 2008.

⁴⁷ 佟明亮. “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障碍与对策[J]. 黑龙江科学, 2016(21).

⁴⁸ Jane Perlez. Xi Jinping Calls for Cooperation and Partnership in U.N. Speech[J/OL]. New York Times, 2015-09-27. <https://www.nytimes.com/2015/09/29/world/asia/china-xi-jinping-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html>.

⁴⁹ Susan Strange. Territory, State, Authority and Economy: a new realist ontology of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M]// The New Realism: Perspectives on Multilateralism And World Order.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97. Pp 8-9.

⁵⁰ Kees van der Pijl. Atlantic Rivalries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 Globaliz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Multilateralism[M]. Edited by Stephen Gill.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97. Pp. 213-215.

⁵¹ 桑秀国. 日美贸易谈判与日本国内市场[J]. 现代日本经济, 1991(04):39-41+30.

科的叶利钦，并通过美国大使馆沟通专家帮助叶利钦与军事指挥官建立联系，并以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资源以提供其个人和通信安全。欧盟和东欧经济也由此受到创击。⁵²

4.3 浩瀚星海辛探垠

古人观天，天照人心。浩瀚晨星是普照人类的共同未来（shared future），也是未来对现代国家、传统国家的滋滋照料。科学的发展通过加密（classify）和集合（codify）形成个体生活所需资料，文明间的数字流动。天宇广阔的认知推移以书面形式形成知识智化城市生活，柔化认知与知感。信息化形成数据构成当代意涵的历史，信息的流动连接全球现当代世界，传统人文和文人。远古的恒星照耀着束光接连的地球如天宇行星衬映星球生命之跃活，时之漫漫，间之展延。间时观中宙宇学科固科学本根，生产的技术精进和精化的物态质物性属知认发展进速着空时，人之寸日。极化世界的累积趋控着地貌的流变，管理和协调的难度系数和发展创新。新创的界石和瀚宇的索探固方着人流，积化社会发展。固化的体系和体系的变迁在人媒和媒体、媒介的改变中更变着文化和时代变迁，代基关系，世界的网格和全球维度的向量发展。科学团体对星海认知的加速势必革更脑力工作者和人力工作者的不协调发展，包括多语言群体的迷识。某时政治、知识、认知、系统精神的异变需同协治政理化辩，全球知识与实体空间的协作、调协。时间群体的迥异即是客观的观测、丈量、测量，时同于识知群体与实践、执行群体合配，化衍。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国家的物理属性和组织的非物理属性得以区分，信息和信息流动化变得以分区。技术理性的湛精以将改变合整发展条理，理性工具开创将进一步推动发展跃腾。文明的温宜是界世的自由（freedom），发展的竞争是多维时间和空间、认知、物质的调控。科学的力量消融着传统政治力量，人的传统亦迁变着文化。运动模式对行动和认知习惯起改变作用，正向与负向、“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多边主义、复合体系、人群的嬗变。

知识实践的个体是先验的，政治化的认识论（epistemology）是先验中的后验，以后验进行先验认识论（epistemology）的弥合对知识的时间沟和知识中的政治部分有所知御。玛丽·柯道尔文章中的图表以“技术革命”为节点，“大爆

⁵² Kees van der Pijl. Atlantic Rivalries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 Globaliz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Multilateralism[M]. Edited by Stephen Gill.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97. Pp. 215-217.

炸引发的革命”为发生，以“年”为单位阐释了 1770s-2000s 中的历史发展。其历史记录以装配，转折时，布置段为基础进行排列。凯恩斯主义刺激和福特主义军事范式以传统战争形式逼迫下游产业和产品生产，以自身的现代性将新自由主义回退到前现代性之中；或者通过对全球立法进行全球可持续性经济，将新自由主义纳入下游产业和衰退性增长以保护人的安全。其认知点（view point）可从表 5.1（Table 5.1）中看出。“大爆炸”作为认知原点是宇宙学时，“年”的排列从先后顺序而言将等照的人放入主观时间认知中。也因而在历史记录 Figure 5.1 中从装设时（工）序进行。地缘政治从本质上就是其组织性，以对世界的观察认知优势进行，并在对物的用、控制中获得“黄金时代”，即“使用权(utility)”。也正是在这个意涵上苏珊·斯特兰奇文中指出美国对轴线和贸易的控制以主动出口限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ictions, VERs）和主动进口扩张措施（voluntary import expansion measures, VIEs）进行。它以全球地面和海面运维进行，知识生产和认知进行思想侧改造，并进行的优势规定和控制管理。从地缘政治和实践而言通过强迫或劝服手段进行，即组织优越性主观。也正是如此地缘政治结果和战争构成了扩张历史。这种优越性从认知上配合宏观压制性（dominance）进行，或者以价值劝服（value persuasion）引导。时间的主观性和时间的客观性难以兼知，逻辑成为时间的延伸和以工具性对知识获取与发布成为控制体系。从人文角度而言阳刚（macho）、占有（possessive）、压制（dominance）是自古既有的人之主观。在道德和伦理层面则以对“独裁者”售卖主权国家资源以求自身富裕为攻击和舆论攻击进行。同时在“贸易、合法性、民主”中以“人权”为借口，国家间法律，包括联合国和国际贸易组织等国际实体进行机构化控制。国家主义作为国民经济（GDP）意识形态和区域性经济总量（GNP）得以保持优势元素并通过拆分等“动作分解”的方式保持工人群众稳定。⁵³而在市场植入需求和保持优势的双重动机下对技术和发展型技术的垄断形成了 Bjorn Hettne 所谓的“双向运动”。⁵⁴这就是全球军事部署（hegemony）形成的权力，即 Kees van der Pijl 所说的“某种控制概念”和“处理挑战的‘配方’”，本土所谓的“霸权”。

⁵³ Peter Singer. *One World: The Ethics of Globalization*[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96-105.

⁵⁴ Bjorn Hettne. *The Double Movement: global market versus regionalism*[M]// *The New Realism: Perspectives on Multilateralism And World Order*.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97. Pp 224-225.

4.4 小结

外空管理和地面、海洋管理的区间形成了新时期的全球权力。它在服务于地面人类需要的同时形成了国家与跨国团体的权力竞争赛场。正如殖民史和两次世界大战所教导服务者和被服务者之间关系的不平等是并存的。这种不平等包括人群向下游链的集体转移。地缘政治和权力政治的历史同时也是极化竞争的历史。这种极化同时由时间的不对等造就。联合国的形成时序和军事集团间的商议配分共同构成了历史的两极。⁵⁵在此意味而言世界本就是一个已被安排好的无真实意味未来的行为体。确切的来说它是由确立和消抵的矛盾辩证运动中形成的多向运动（kinetics）。军事政权（military regimes）仍是全球政治的行为体、正义概念的定义方，发展观的制定主体，组织执行者。

IJSER

⁵⁵ United Nations. History of The UN Charter[J/OL].

<https://www.un.org/en/sections/history-united-nations-charter/1945-san-francisco-conference/index.html>.

结 论

美军的全球军事部署是既定的存在，历史发展的结果，正是如两岸三地的历史演变。技术可能的系统性改变影响着当代高度依赖信息的社会。权力对人的教条（indoctrination），由教条形成的权力影响仍充斥于社会各界。美国的全球军事部署构成的区域介入权力形成了各国家领土权力的边际运动。美国对各国政、经，包括军事权力的介入从现实历史和历史现实而言都是危险因素。也正是如此本研究可说是史蒂芬·吉尔所说的“反全球军事部署形式的知识”。⁵⁶科学荟聚的发展需要更为严谨的科学体系架构管理模式，作为知的科学、实验的科学、探索的科学、应用的科学、应急的学科、时空的交错、理论与现实的交汇、未知的可知和已知的未知对人和环境，自然和人的影响，等等；这些都不是论文所能承载，但不代表不需在论文中提出。

对未来的期许（The anticipation of the future）无法脱离多方对现实的关照和评估，精准的判断和慎微的行动。区域统一的议程是各军方及军科、报情和知认部署体系决策链的整合，但更为基础的是人的基本发展。本文不再赘述。

⁵⁶ Stephen Gill. Finance, Production and Panopticism// Globaliz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Multilateralism[M].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97. Pp. 73.

历史文献

- 1、 Robert W. Cox. *The New Realism: Perspectives on Multilateralism and World Order* [M].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 2、 Stephen Gill. *Globaliz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Multilateralism* [M].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97.
- 3、 Spence, Jonathan D.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M].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91.
- 4、 Gavin Menzies. *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 [M]. Perennial, 2004.
- 5、 周琪译,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 [M]. 新华出版社, 2013-01.
- 6、 James T. C. Liu, Wei-ming Tu. *Traditional China* [M]. Prentice-Hall, Inc. 1970.
- 7、 Ellen Alderman, Caroline Kennedy. *In Our Defense: The Bill of Rights in Action* [M]. Perennial, 2002.
- 8、 Peter Alter. *Nationalism (Second Edition)* [M]. Hodder Education Publishers. 1994.
- 9、 Craig Calhoun, Georgi Derluigan. *The Deepening Crisis: Governance Challenges after Neoliberalism* [M].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 10、 Peter Singer. *One World: The Ethics of Globalization* [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11、 Barack Obama. *US-China Policy Under an Obama Administration* [J]. China Brief Exclusive, 2008.
- 12、 顾学稼. 沙俄出售阿拉斯加原因考析 [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7(03):101-112.
- 13、 麻玲. 从史迪威、魏德迈和赫尔利在华活动看太平洋战争后的中美关系 [J]. 社会科学战线, 2005(05):326-328.
- 14、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Books on the Far East Since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J/OL]. Foreign Affairs, 19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922-12-15/books-far-east-washington-conference>.
- 15、 Gustav Stresemann. *The Economic Restoration of the World* [J/OL]. Foreign Affairs, 1924.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924-06-15/economic-restoration-world>.
- 16、 高红明. “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波洛克与诺伊曼之争 [J]. 学术界, 2018, 244(09):48-55.
- 17、 佟明亮. “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障碍与对策 [J]. 黑龙江科学, 2016(21).
- 18、 Jane Perlez. *China Surprises U.N. With \$100 Million and Thousands of Troops for Peacekeeping* [J/OL]. New York Times, 2015-09-28.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projects/cp/reporters-notebook/xi-jinping-visit/china-surprises-u-n-with-100-million-and-thousands-of-troops-for-peacekeeping>.
- 19、 桑秀国. 日美贸易谈判与日本国内市场 [J]. 现代日本经济, 1991(04):39-41+30.
- 20、 杨东. 再谈滇缅公路的关闭——英国外交部决策过程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3, No. 185 05 114-119.
- 21、 Hurly, Patrick J.. *Resignation of Ambassador Patrick J. Hurley;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Certain Charges Made by the Ambassador* [DB/OL].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Library.
<http://images.library.wisc.edu/FRUS/EFacs/1945v07/reference/frus.frus1945v07>

[7. i0010. pdf](#)

22、John F. Kennedy. REMARKS OF REPRESENTATIVE JOHN F. KENNEDY AT THE PHILIP J. DURKIN TESTIMONIAL DINNER[D/OL]. SALEM, MASSACHUSETTS, 1949-01-30.

<https://www.jfklibrary.org/archives/other-resources/john-f-kennedy-speeches/salem-ma-19490130>.

23、FBI records. World War II [D/OL]. The Vault. <https://vault.fbi.gov/world-war-ii>.

24、郭艳. 全球化语境下的国家认同[D]. 中共中央党校, 2005.

IJSER